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钟婵婵¹, 杨磊²

¹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 浙江 杭州

²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 河南 新乡

收稿日期: 2023年6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3年7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3年8月9日

摘要

目的: 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大学生主观社会阶层与人际信任关系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人际信任水平量表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随机选取325名被试进行测量。结果: 1) 主观社会阶层分别与社会支持、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 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社会支持预测人际信任, 消极应对方式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会支持间起调节作用。结论: 1) 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显著预测人际信任水平。2) 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水平中起完全中介作用。3) 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水平的间接效应受到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 社会阶层, 消极应对, 人际信任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ratum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Chanchan Zhong¹, Lei Yang²

¹School of Scienc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²School of Psychology,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Received: Jun. 26th, 2023; accepted: Jul. 28th, 2023; published: Aug. 9th, 2023

Abstract

Object: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stratum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A total of 325 subjec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Using the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and the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o test them. **Result:** 1)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social clas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social clas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2) The social support fully mediated the link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plays a moderated role in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1) The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2) The social support plays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and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3)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he subjective social stratum on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through the social support is regulated by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tratum, Negative Coping, Interpersonal Trust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指个体基于对匿名他人行为和意图的善意预期, 自愿将社会资源交由对方处置的一种心理意愿(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它影响着个体的人际关系质量与身心健康, 被誉为社会发展的“粘合剂”(Ma et al., 2018)。作为一种社会信号机制, 人际信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 能够促进或损害经济、社会等各种形式的交往(Ben-Ner & Halldorsson, 2010)。它是人际交往的基础, 是个体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会交往关系的基础(杨颖, 2020), 是团队合作的基本条件(赵静, 薛芳, 2020)。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交往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近一年来“搭子式交友”与“大学生式信任”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话题中。大学生身为社会生活的主体, 在很多情况下展现出对陌生人的信任, 比如会和陌生人相约看演唱会、吃饭、打卡游玩地点, 会将手机、平板类贵重物品用来占座, 将自己行李交给陌生人看管或是用来排队, 为遛狗将自己的身份证、学生证等交给他人保管等等。大学时期是信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也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 那么有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的产生机制如何, 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究。

人际信任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主观社会阶层是其因素之一。主观社会阶层强调个体主观感知, 即“自己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知”, 是认为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 主观评定的个人所处社会阶层(Kraus, Piff, & Keltner, 2009)。关于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 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一方面, 以不同阶层的资源占有量出发, 高阶层会拥有更多的教育、培训、实践资源, 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 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龚娇, 李伟强, 陈铭, 汤明,

袁博, 2019;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 另一方面, 从认知与文化角度考虑, 低阶层的信任水平可能更高(Piff, Stancato, Cote, Mendoza-Denton, & Keltner, 2012)。当然也有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 2013)。由此可推论, 其中或许有其他因素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支持是出现在两个个体之间、可为一方或双方感知到的意在增强被支持者福祉的资源交换, 在类型上有客观支持和主观体验之分(崔珂, 沈芝芳, 宋玉田, 2023)。领悟社会支持指的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价, 是对自己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信念(郭佩佩, 高凯, 姜茂敏, 王德文, 2023)。已有研究发现, 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的客观支持差异显著(谭雪晴, 2007), 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能正向预测社会支持水平(杨胜娟, 2009); 而领悟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之间也有显著正相关(叶宝娟, 杨雪, 雷希, 郑清, 2018), 获得来自高校、家长和同辈的关心、认可和支持越多, 越能形成较好的品质信任和人际情感信任维系, 增加其对所在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郭嫒, 2018)。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可能会影响不同阶层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

应对方式是当外在或内在要求超出个人资源时个体所采取的认知或行为策略(苏志强, 马郑豫, 2023)。消极应对的特点是回避和发泄, 不采取正面的方式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应激事件等。而低阶层拥有的资源较少, 在面对无法处理或者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可能会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 比如面对“内卷”, 有许多的大学生选择了“摆烂”、“躺平”式的生活, 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是会影响个体对社会支持的领悟水平? 本文将探讨消极应对方式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会支持之间如何起作用, 又如何影响到人际信任水平。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讨论主观社会阶层对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 综合考虑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方式和人际信任的动态关系。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主观社会阶层可以预测人际信任水平;

假设 2: 主观社会阶层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影响人际信任;

假设 3: 消极应对方式通过影响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关系进而影响人际信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发放电子问卷 325 份, 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与科学, 根据问卷填写时长, 剔除无效问卷 7 份, 占有回收数据的 2.15%; 筛选出有效数据 318 份, 回收有效数据为 97.85%。被试中男生 123 人、女生 195 人; 年龄在 17~25 岁, 平均(20.57 ± 0.90)岁; 年级囊括大一到大五。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学资料调查表

本研究中的人口学资料调查表的内容包括: 性别、年龄、所在年级。

2.2.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采用 Adler 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Adler, Epel, Castellazzo, & Ickovics, 2000), 阶梯共分为 10 级, 从低到高分别代表不同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等级越高, 意味着社会地位越高。在问卷中, 请被试结合其自己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 选择相应选项后的数字代表自己的家庭社会阶层。

2.2.3. 人际信任量表

采用丁姩瑶修订的人际信任量表(ITS)(丁姩瑶, 彭凯平, 2020), 修订后的量表共 10 个项目, 包含两个维度: 社会现象信任和承诺行为信任, 采用 Likert 五点评分法, 从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依次计 1 至 5

分。在本研究中两个分量表社会现象信任、承诺行为信任和整体的中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47、0.731 和 0.686。

2.2.4.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修订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姜乾金, 2001), 分别测定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各种社会支持, 如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 同时以总分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含 12 个自评项目, 每个项目采用七级计分法。为了贴合大学生的实际情况, 将“领导、亲戚、同事”换成了“老师、亲戚、普通同学”, 其他无变动。在本研究中, 量表的中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41。

2.2.5.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由解亚宁等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解亚宁, 1998), 该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分量表)组成, 包括 20 个条目。在本研究中只采用消极应对的分量表, 其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60。

2.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以及 Process 插件。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检验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分析结果显示, 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的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9 个, 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3.21% (远小于 40%), 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 进行以下分析。

3.2.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ous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

	主观社会阶层	领悟社会支持	人际信任水平	消极应对水平
主观社会阶层	1			
领悟社会支持	0.239**	1		
人际信任水平	0.130*	0.156**	1	
消极应对水平	-0.017	0.036	-0.113*	1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

对主观社会阶层、人际信任、领悟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1 所示。主观社会阶层与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符合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 SPSS22.0 的 process 插件中, 参照 Hayes 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叶宝娟, 温忠麟, 2013)。选择 Model7, 样本量 5000, 在 95%置信区间下, 以主观社会阶层为自变量 X, 人际信任为因变量 Y, 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 M, 消极应对方式为调节变量 V。

Table 2. The mediation model tes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表 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检验

	Y			M			Y		
	B	SE	t	B	SE	t	B	SE	t
X	0.130	0.056	2.325*	0.239	0.055	4.370***	0.098	0.057	1.719
M		-			-		0.132	0.057	2.319*
R 方		0.017			0.057			0.033	
F		5.403			19.092			5.427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01$ 。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水平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beta = 2.325, p < 0.05$); 加入领悟社会支持以后, 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对人际信任预测作用显著($\beta = 2.318, p < 0.05$), 但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总效应值为 0.130, 直接效应值为 0.098, 间接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 $(0.239 \times 0.132)/0.130 = 0.243$ 。说明主观社会阶层作用于人际信任的效应有 24.3% 是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起作用的。假设 1、2 得到验证。

Table 3. A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test using negative coping as a regulating variable
表 3. 以消极应对为调节变量的条件过程分析检验

	Y			M		
	B	SE	t	B	SE	t
X	0.222	0.054	4.103***	0.098	0.057	1.719
V	0.049	0.054	0.916			
M				0.132	0.057	2.319*
X × V	-0.170	0.052	-3.248**			
R 方		0.089			0.033	
F		10.245			5.427	

注: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而消极应对在此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beta = 2.319, p < 0.05$), 说明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对因变量人际信任水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主观社会阶层 × 消极应对对社会支持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beta = -3.248, p < 0.01$), 说明调节变量消极应对对自变量主观社会阶层到中介变量社会支持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 3 得到验证。

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如图 1 所示, 对于消极应对水平较低的大学生, 主观社会阶层越高, 能感受到更多地社会支持; 但对于消极应对水平较高的大学生来说, 主观社会阶层对领悟社会支持不再有预测作用。说明消极应对水平越高, 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会支持之间的正向预测作用关系越弱。

4. 讨论

本研究以研究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为出发点, 探讨其他三个变量与人际信任这一变量的关系。研究发现, 主观社会阶层、社会支持、人际信任水平三个变量之间有显著相关, 而消极应对水平与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之间相关并不显著, 可以进一步探讨消极应对与其它三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人际信任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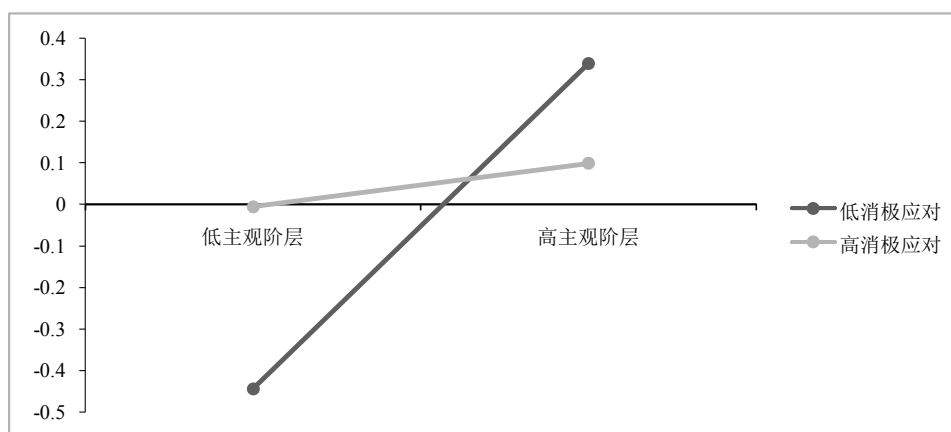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 on subjective social stratum and social support
图 1. 消极应对方式在主观社会阶层与社会支持上的调节作用

4.1.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发现, 主观社会阶层与人际信任之间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个体的社会阶层越高, 信任的水平也会越高。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谭旭运, 2016; Navarro-Carrillo, Valor-Segura, & Moya, 2018)。这可以用资源因素理论来解释, 高阶层拥有更多地资源, 比如教育、培训、实践等, 在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上更有优势, 所以高阶层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更能面对与陌生人交往所带来的风险(龚娇, 李伟强, 陈铭, 汤明, 袁博, 2019;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 2015)。因此, 社会阶层越高, 人际信任的水平也会越高, 验证了假设 1。

4.2.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 不同阶层的社會支持差异显著相关, 社会阶层越靠上, 社会支持的水平也就较高(程永佳, 2013)。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社会支持的网络依赖于人际资源的建立, 而人际互动通常是一个社会资源相互交换的过程, 与社会下层相比, 其他阶层的个体掌握的资源较为丰富, 自然就拥有越多的人际交往的机会(杨胜娟, 2009)。因此社会阶层越高, 获取的社会支持也就越高。

本研究也证实了领悟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显著预测作用。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显著影响, 二者呈显著正相关, 社会支持越大, 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郭嫻, 2018; 叶宝娟等, 2018)。这可能是由于社会支持低的个体在处理问题时, 由于往常能够获取的资源有限, 个体对自己能够获得的支持有一个低的预期, 所以独立意识和自立能力会更强, 往往更愿意依靠自己, 拒绝他人帮助去解决问题, 使得他们社会经验更为丰富的同时, 自我保护意识和戒备心增强, 导致人际信任水平降低。故而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有正向预测作用。

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的模型进行检验, 发现主观社会阶层→人际信任水平的路径不再显著, 只有主观社会阶层→领悟社会支持→人际信任水平显著, 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之间其完全中介作用。高阶层因为本身所有的资源能够有更多的人际互动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而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会善于利用其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去处理个体遇到的问题, 导致其对周围人的人际信任水平增高。

4.3. 消极应对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 消极应对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领悟社会支持之间起调节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已有

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当个体的消极应对水平越低时, 主观社会阶层越高, 越能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 进而更信任他人。可能是由于消极应对水平较低的个体, 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更多地依靠自己解决问题, 积极并且勇于尝试, 他们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较为主动。基于资源因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 高阶层有更多可支配的资源, 易于获得周围人的支持和帮助, 容易形成他人对自己友善热情的印象, 增加其对所处环境及交换对象的信任水平。当个体的消极应对水平较高时, 主观社会阶层不能直接预测人际信任, 也无法通过领悟社会支持间接预测人际信任。对于消极应对方式较低的个体, 主观社会阶层更容易预测其领悟社会支持的水平。

综上所述, 基于“资源因素理论”, 高阶层相比于低阶层有更多的可支配资源量, 就可以获取较高的社会支持; 而个体获得来自高校、家长和同辈的关心、认可和支持越多, 越能形成较好的品质信任和人际情感信任维系, 增加其对所在环境以及交往对象的信任, 进而形成较为融洽的人际信任氛围。消极应对水平较低的个体在面对问题时会有更多的想法、更容易变通地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能够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5. 结论

- 1) 主观社会阶层对人际信任水平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 2) 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际信任水平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主观社会阶层能通过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水平间接产生影响。
- 3) 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水平的间接效应的前半段受到消极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随着应对方式得分的提高, 主观社会阶层对社会支持的预测作用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

参考文献

- 程永佳(2013). 脱农离村群体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研究——基于社会流动角度的实证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 (5), 108-115. <https://doi.org/10.13262/j.bjsshkxy.bjshkx.2013.05.022>
- 崔珂, 沈芝芳, 宋玉田(2023). 震后社会支持对灾民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范围综述. *灾害学*, 38(3), 148-155.
- 丁妩瑶, 彭凯平(2020). 中译人际信任量表勘误及修订. *心理月刊*, 15(6), 4-5+7. <https://doi.org/10.19738/j.cnki.psy.2020.06.003>
- 龚娇, 李伟强, 陈铭, 汤明, 袁博(2019). 社会阶层与信任之间的关系: 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心理技术与应用*, 7(6), 346-357. <https://doi.org/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6.004>
- 郭佩佩, 高凯, 姜茂敏, 王德文(2023). 高校教师焦虑状况及其与工作-家庭冲突和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7(7), 610-615.
- 郭永玉, 杨沈龙, 李静, 胡小勇(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8), 1299-1311.
- 郭嫒(2018).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河南社会科学*, 26(6), 112-116.
- 姜乾金(200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10), 41-43.
- 解亚宁(1998).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 53-54.
- 苏志强, 马郑豫(2023). 童年期友谊质量与孤独感的纵向发展关系: 应对方式的共变作用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39(1), 31-39. <https://doi.org/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23.01.04>
- 谭旭运(2016).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4), 64-70. <https://doi.org/10.16822/j.cnki.hitskb.2016.04.008>
- 谭雪晴(2007). 高师贫困生人际信任与社会支持的特点及关系研究.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7(5), 345-347.
- 杨沈龙, 郭永玉, 李静(2013). 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 *心理科学进展*, 21(12), 2245-2255.
- 杨胜娟(2009). 社会阶层、社会支持、社会态度、适应策略对男性犯罪行为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
- 杨颖(2020). 大学生自我和谐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高教学刊*, (32), 65-68.

<https://doi.org/10.19980/j.cn23-1593/g4.2020.32.016>

- 叶宝娟, 温忠麟(2013).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 甄别和整合. *心理学报*, 45(9), 1050-1060.
- 叶宝娟, 杨雪, 雷希, 郑清(2018). 网络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网络助人行为的影响机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6(6), 1208-1210+1214. <https://doi.org/10.16128/j.cnki.1005-3611.2018.06.034>
- 赵静, 薛芳(2020). 心理素质拓展训练对大一学生积极情绪和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 *科技创新导报*, 18(10), 224-226.
-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 586-592. <https://doi.org/10.1037/0278-6133.19.6.586>
- Ben-Ner, A., & Halldorsson, F. (2010). Trusting and Trustworthiness: What Are They, How to Measure Them, and What Affects Them.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1, 64-79. <https://doi.org/10.1016/j.joep.2009.10.001>
-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992-1004. <https://doi.org/10.1037/a0016357>
- Ma, F. L., Wylie, B. E., Luo, X. M., He, Z. F., Xu, F., & Evans, A. D. (2018). Apologies Repair Children's Tru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76, 1-12. <https://doi.org/10.1016/j.jecp.2018.05.008>
- Mayer, R. C., Davis, J. H., & Schoorman, F. D. (1995).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709-734. <https://doi.org/10.2307/258792>
- Navarro-Carrillo, G., Valor-Segura, I., & Moya, M. (2018). Do You Trust Strangers, Close Acquaintances, and Members of Your Ingroup? Differences in Trust Based on Social Class in Spai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5, 585-597.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16-1527-7>
- Piff, P. K., Stancato, D. M., Cote, S., Mendoza-Denton, R., & Keltner, D. (2012).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 4086-4091. <https://doi.org/10.1073/pnas.1118373109>